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著 作 单 行 本

恩 格 斯

德国农民战争

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责任编辑：杜文丽

装帧设计：汪 莹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胡 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12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16739 - 8

I . ①德… II . ①恩… ②中… III . ①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

IV . ①A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974 号

书 名 德国农民战争

DEGUO NONGMIN ZHANZHENG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3

字 数 158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6739 - 8

定 价 32.00 元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联 合 起 来！

编辑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典，是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文献。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的形势，满足广大读者多层次的需求，我们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编译经验，考察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读物，吸收了理论界提出的宝贵建议，精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述，编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文库辑录的文献分为三个系列：一是著作单行本，收录经典作家撰写的独立成书的重要著作；二是专题选编本，收录经典作家集中论述有关问题的短篇著作和论著节选；三是要论摘编本，辑录经典作家对有关专题的论述，按逻辑结构进行编排。

文库编辑工作遵循面向实践、贴近群众的原则，力求在时代特色、学术质量、编排设计方面体现新的水准。

本系列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的著作单行本，主要收录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著作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同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不同时期为这些著作撰写的序言、导言或跋。有些重点著作还增设附录，收入对理解和研究经典著作正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和史料。列入著作单行本系列的文献一般都是全文刊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等篇幅较大的著作采用节选形式。

著作单行本系列所收的文献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最新版本的译文，以确保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准确性。自1995年起，由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陆续问世，迄今已出版24卷；从2004年起，我们又先后编译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著作单行本系列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采用了上述最新版本的译文，对未收入上述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我们按照最新版本的编译标准进行了审核和修订；列宁著作则采用由我局编译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二版增订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译文。

著作单行本系列采用统一的编辑体例。每本书正文前面均刊有《编者引言》，简要地综述相关著作的时代背景、理论观点和历史地位，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把握要义；同时概括地介绍相关著作写作和流传情况以及中文译本的编译出版情况，供读者参考。正文后面均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以便于读者查考和检索。

著作单行本系列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列宁全集》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的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加的；未

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注；人名索引的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文里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在列宁著作中，凡注明“俄文版编者注”的脚注都是指《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编者加的注，人名索引中的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印的是相关人物的真实姓名，未加黑体的则是笔名、别名、曾用名或绰号。此外，列宁著作标题下括号内的日期是编者加的；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2014年6月

编者引言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在总结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撰写的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1848—1849 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在 1848 年初意大利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中揭开了序幕；紧接着，法国发生二月革命，在各国引起强烈反响，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开始席卷欧洲。在这种形势推动下，1848 年 3 月柏林爆发武装起义，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德国各地。在德国境内，领导这场革命的是资产阶级，而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斗争前沿、发挥主力作用的却是工人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崛起越来越感到恐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中，他们从犹豫退缩到妥协动摇，直至彻底背叛革命，同反动势力相勾结，摧残和迫害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者，使轰轰烈烈的革命遭到了失败。在欧洲其他国家，革命也相继失败，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转入低潮。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德国革命，同时密切关注各国的形势，认真分析和研究欧洲这场革命的进程，在他们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运用《共产党宣言》阐明的科学理论和革命策略及时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革命失败后，他们科学地分析这场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全面地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系列著作，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

恩格斯撰写《德国农民战争》的直接动因，是要让德国工人阶级了解本国的革命传统和先辈的斗争历史，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汲取智慧和力量。

1848 年革命失败以后，在德国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工人运动从高涨走向低落，由勃兴变为沉寂。工人群众及其领导者一度悲观失望、情绪低沉，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和胜利的希望。面对这种形势，恩格斯认为，德国人民自己的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经历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可以用来激励德国工人阶级的斗志，重新点燃他们的革命热情。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开头写道：

“历时两年的斗争过去以后，目前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见本书第 21 页）

为此，恩格斯充分利用已有的史料，采用生动细致的笔法，为广大读者描绘和展现了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德国农民前仆后继、顽强斗争的历史画卷。在这部著作中，人们既看到遍布德国各

地的农民组织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斗争实况，又看到以托马斯·闵采尔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群像；既看到农民起义军浴血奋战、抗击强敌的壮烈场景，又看到农民革命家深入各地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艰辛历程。

事实证明，这部思想深刻而又饱含深情的著作在工人群众及其领导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恩格斯生动地描述了 300 年前德国农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备受凌辱的处境、失去自由的痛苦和渴求解放的心情，使 300 年后的德国工人感同身受，如临其境，进一步激起了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愤恨；恩格斯在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德国农民揭竿而起的过程、同仇敌忾的斗争、越挫越勇的毅力和宁死不屈的气概，特别是详细地介绍了德国农民与平民在 300 年前所怀抱的消除一切剥削、实现财产公有的社会理想，使广大工人群众深受启发和鼓舞，增强了在科学理论指引下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勇气和信心。

总之，在欧洲反动时期，恩格斯及时推出的这部著作使工人们在逆境中重新振奋起革命精神。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革命感召力；它曾多次再版，在工人群众中深受欢迎、广为流传，为促进工人运动走出低谷、重现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恩格斯撰写《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分析，科学地总结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引导德国工人运动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发展。

1848—1849 年的德国革命运动与 1525 年的德国农民革命运动相距 300 年之久，但在恩格斯看来，这两次革命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共同的经验教训。

首先，两次革命都是被压迫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两次革命都同样遭到了失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由于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叛徒，而充当叛徒的又是同一个阶级。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背叛革命的是资产阶级；而在 1525 年革命中，背叛革命的则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这个阶级投靠封建诸侯和天主教反动势力，对农民与平民组成的革命派进行血腥屠杀。恩格斯指出，16 世纪的市民阶级就是 19 世纪资产阶级的前身。因此，他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引言中强调：

“自从农民战争以来，300 年过去了，有些事物已经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我们将会看到，1848 年和 1849 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 1525 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见本书第 21 页）

其次，两次革命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相同的原因，那就是地方狭隘性严重地影响了革命阵营的联合行动和紧密团结。在 1525 年革命中，“地方和各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断送了整个运动”（见本书第 122—123 页）。起义的农民各自为阵、互不关心；而农民与平民又彼此分离、不通声气，从未“采取过集中的全国性的行动”（见本书第 123 页），结果被协同作战的反动势力各个击破。在 1848 年革命中，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的地方狭隘性同样非常严重。各阶级的利益“互相冲突，每一个阶级都自行其是”（见本书第 123 页）；就

连工人阶级内部也缺乏紧密的联系，没有统一的步调。因此，在资产阶级背叛以后，革命力量很快就在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陷入困境，遭到溃败。

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深入反思、获得启迪。首先，他们应当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洞察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并揭穿这个阶级的谎言和骗局，准备同它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牢牢掌握革命的主动权，决不让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巩固其阶级统治”的“垫脚石”（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653页）。其次，工人阶级应当深刻地认识农民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把农民看成是“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见本书第11页），与农民联合起来，共同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而奋斗。第三，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加强革命队伍团结和采取正确斗争策略的重要性，坚决摒弃一切地域的、行业的、宗派的狭隘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心同德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在《德国农民战争》的结尾，恩格斯还以极其凝练的文字论述了1525年革命与1848年革命的本质区别。他指出，“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一旦失败就难以重新崛起；而1848年的革命“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一个洲的狭窄范围之内”，曾经作为这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见本书第124页）因此，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工人阶级现在就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充分准备。

如果说，恩格斯分析1525年革命与1848年革命的相似之处，

是为了引导工人阶级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增长睿智，那么，他论述这两次革命的本质区别，则是为了让工人阶级认清形势、树立信心。我们看到，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将历史比较的科学方法运用到了极致，在最关键的时刻，用最清晰的语言让工人群众明白：什么才是革命者必须具有的远见、胸怀和胆识。

三

恩格斯撰写《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有指导革命斗争的现实目的，而且有传播科学理论的深远考虑。

19世纪中期，唯心史观还统治着德国思想、文化和学术舞台。在历史研究领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不同学派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评价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历史人物时，往往歧见迭出、争论激烈，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却始终是一致的：他们都“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不是立足于“现实历史的基础”；他们都“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对于发生在16世纪初期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是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考察和评析的。他们的研究远离当时经济社会的实际背景，仅仅着眼于神学思想的论争、宗教信仰的对立和政治理念的分歧，总是“把某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见本书第36页），看不到“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见本书第36页），看不到“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见本书第36页），因而也就从

从根本上否认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由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学者不可能对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进程、意义和结果进行中肯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敏锐地察觉到了唯心史观的盛行对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在撰写《德国农民战争》时，他设定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农民战争的全过程进行科学分析，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驳斥资产阶级污蔑农民起义的种种谬论，同时也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性质和影响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恩格斯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意图：

“我的论述打算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简要叙述，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 1848—1849 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本书第 4 页）

《德国农民战争》完整地体现了上述思路。这部著作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方式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它不是侧重于精湛的理论概括和缜密的逻辑论证，而是着力于细致的历史描述和中肯的事实分析，将唯物史观的精髓渗透在环环紧扣的讲述和深入浅出的评析之中，使广大工人更容易接受和领悟。这是恩

格斯首创的理论诠释方式，这种方式与其他经典著作的论述方式异曲同工、相得益彰。正因为贴近群众、贴近实践，《德国农民战争》在发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历久弥新，一直是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动教材。

四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史学领域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在这场革命中应运而生的里程碑式的力作。这部著作为史学这门古老学科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经典范例。

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可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应当具有怎样的理论品格和学术风格？史学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初创时期，这是亟需回答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说过：“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页）恩格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起步的时刻，为这门学科的建设破解了难题，树立了标杆，开了个好头。对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恩格斯没有用抽象的理念进行笼统的论述，而是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作出了生动具体的回答。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通过周密考察德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通过细致分析这一重要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通过全面论述这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本质与现实意义，十分清晰地

告诉人们：必须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历史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真相、阐明历史规律；必须同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廓清迷雾、捍卫真理，才能使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必须自觉地用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让最普通的劳动者也能够以史励志、以史明理、以史为鉴，才能真正发挥史学的作用；同时，必须尊重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科学地利用历史文献，充分地运用辩证方法，妥善地实现史论结合，才能不断开拓历史研究、历史比较、历史编纂和历史普及的新途径。

这些基本原则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引导他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并以丰富的研究成果彰显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

五

《德国农民战争》写于 1850 年夏秋，最初发表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合刊，1852 年 1 月 1 日—1853 年 2 月 1 日在纽约《体操报》第 3—20 号上转载。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中的素材。在恩格斯生前，《德国农民战争》曾多次再版。德文第二版于 1870 年 4 月 2 日—10 月 15 日在《人民国家报》第 27—83 号上连载，1870 年 10 月在莱比锡出版单行本；德文第三版于 1875 年在莱比锡出版。

1870年2月，恩格斯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撰写了序言，发表于1870年4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27、28号，并载入第二版单行本；1874年7月，恩格斯对第二版序言作了补充，全文载入第三版单行本。

本书在《德国农民战争》正文前面刊印了上述两篇重要文献。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遵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它的全部内容将证明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同时，恩格斯在序言中还分析了这部著作发表20多年来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变化，指出无产阶级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成长，并作为一个阶级独立采取行动；德国工人运动的最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唤起农业无产阶级并吸收它参加运动。在对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已经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德国工人运动具有两大优越之处，一是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二是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用高昂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德国，“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见本书第18—19页）。德国工人现在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要保持这一光荣地位，就必须在各方面加倍努力；特别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更有责任透彻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认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见本书第19页）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日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凸显出来。马克思指出：“德国